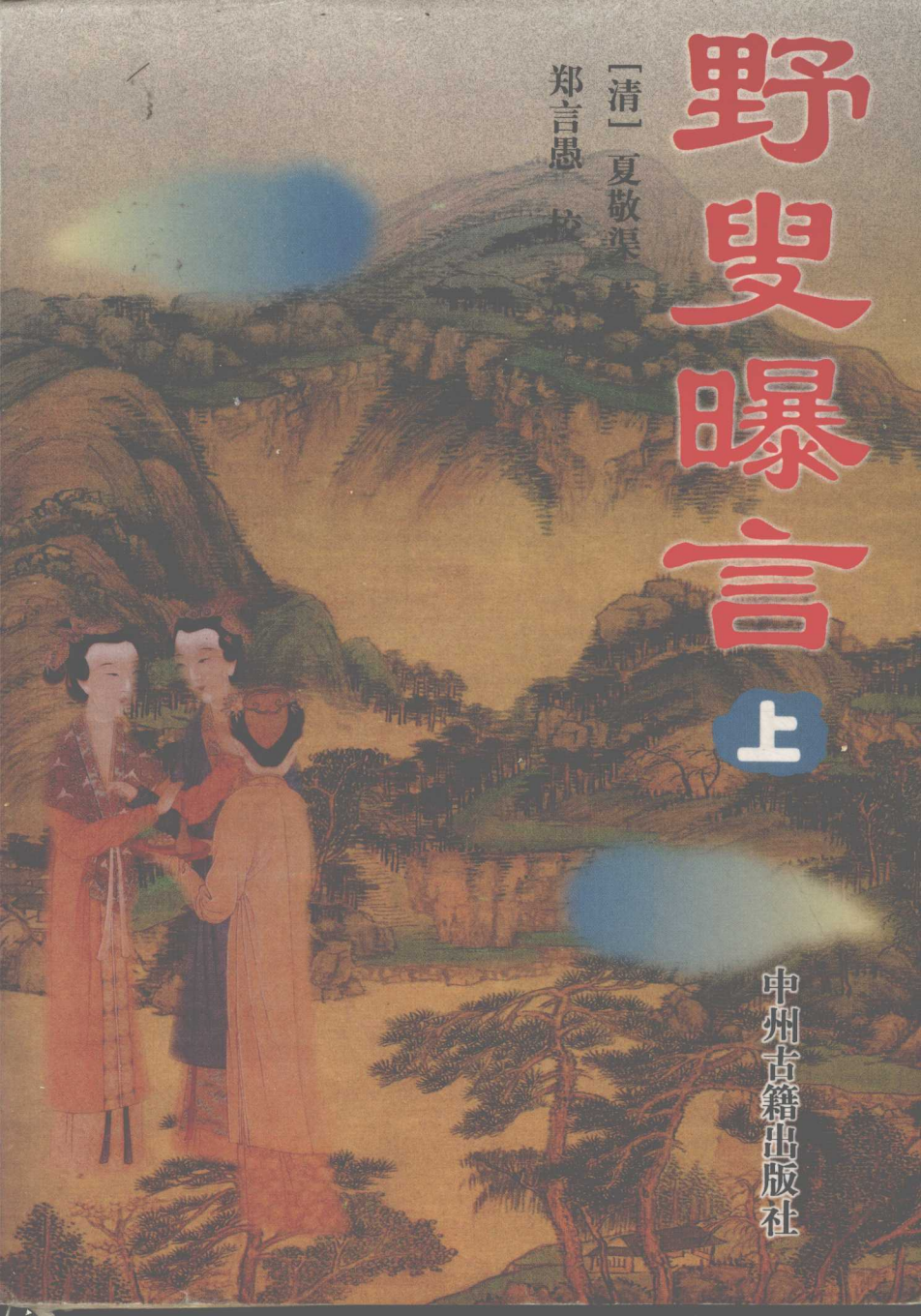


野叟曝言 上

「清」夏敬渠
郑言愚校

中州古籍出版社



野史曝言上

〔清〕夏敬渠 著

郑言愚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新校本野叟曝言序

栾 星

《野叟曝言》是清乾隆中期江苏江阴人夏敬渠所写章回体小说。题名取之《列子·杨朱篇》田父献曝之义，非就著书大旨臆括，与书中描写的人物与事件也没有直接关联。这是一部庞然巨制，全书长达百五十四回，在明清说部中是罕见的。

夏敬渠，字懋修，号二铭。家贫，科场不得意，偃蹇于诸生。然绩学多闻，颇为自负。通经史，湛深理学，旁及诸子诗赋。其于诗、医、兵、算——天文推步之术，尤自视甚高。及壮，为衣食所驱，游幕四方，足迹几遍海内。他大约在乾隆元年初至北京，寻遍历燕、晋、秦、陇。继之假道黔、蜀，自湘浮汉，循江而归。另据传世诗文，也可看出他的行迹是很广的，地处中国东部的苏、皖、浙、闽、赣、鲁、冀等省区，也留有鸿爪雪泥。诗作《阙里谒至圣庙》、《都门除夕》、《风雪中过叭咭岭》、《潯沱河次韵》、《经华山》、《华清池坐汤》、《潼关怀古》、《商州咏古》、《西游辞》、《乌衣卷》、《昭关》、《乌江题项王庙》、《钓鱼台和王臻予韵》、《滕王阁放歌》等，就是他仆仆风尘的见证。《都门除夕》、《滕王阁放歌》等篇，还径直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品而塞入小

说中。阅历既富，胸中自罗丘壑。迨归，“首已斑矣”（光绪八年本西岷山樵原序）。乃屏绝仕进，著书终身。平生著述，除耗费心力最多的这部小说外，尚有《纲目举正》、《唐诗臆解》、《医学发蒙》及诗文合集《浣玉轩集》（有传本）等。二铭的生卒是可以确考的，据《江阴夏氏宗谱》，乃“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九日亥时生，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亥时终”（转引自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终年八十有三（1705 — 1787）。序齿排班，与《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 — 1754）、《歧路灯》作者李绿园（1707 — 1790）、《红楼梦》作者曹雪芹（1716? — 1763），皆略为同辈人。

博闻强记为旧日幕宾重要职业品格之一。以多识及久居西席故，二铭广交游。所遇闻人、长吏，率折节与交。今考知者，除与乡耆宿杨名时兼有世谊外，余有钱塘徐本、山右孙嘉淦、满洲高斌（号东轩）、满洲富纲及宗室怡僖亲王弘晓等。名时、本、嘉淦及斌，《清史稿》皆有传。纲尝巡抚福建，终官云贵总督。弘晓为康熙帝之孙，雍正八年袭封为怡亲王，乾隆四十三年薨，谥僖。

《野叟曝言》约为二铭晚年所撰。然由于自纪无存，属稿及脱稿之绝对年分已无由径断。赵景深《夏二铭年谱》系此役于七十五岁（1779）之下，云“疑此书成于七十以后的数年”，证词仅举“二铭写《野叟曝言》中文素臣做寿，似即暗射（自己）七十大庆”一条，显为揣度之词，似不足证成其说。以文献无征，看来这已是一个难于确考的问题了。

本书是中国说部中的一部“奇书”。它曾以怪诞、迂腐、秽亵及大量不近人情的描写为世诟病，人们的批评是无可非议的。惟毕竟它是历史产物，运笔且云霞满纸，足资观往，可供鉴裁。人虽嘲其满编呓语，然呓语中亦毕现世态。其文献及认识意义，历久而弥新，是终难泯没的。作者以多闻示博，以獭祭炫才，亦曾遭世讥。诚然这是本书的又一明显缺陷，即鲁迅所说“以小说为废学问文章之具”，人们的批评也是无可非议的。然以多闻示博或獭祭炫才，为乾嘉士风，客观上也就不能不影响及于小说创作。非独二铭这部书如此。踵此书而出现的同为江阴人屠绅（1744 — 1801）的《蟬史》，直隶大兴人李汝珍（1763 — 1830）的《镜花缘》，也都有这个毛病。当时本书尚未刊行，不能径说后者是直接受到了前者的启诱。然察流溯源，本书是始作俑者。自然这是小说创作上的一条歧路，然百卉争春，未尝不可并存之，谨备奇卉中奇之尤奇的一枝，那怕是罍粟也好。

二铭把小说故事依托于明代，铺演了一部出于杜撰，然亦缀合不少史事的英雄传奇。主人公姓文名白字素臣。“文白”乃“夏”字析成，为二铭自寓。因而摆进小说最多的，与其说是历史及生活客体，不如说是作者自己——他自己的经术、学问、性行、思绪与幻想。由于作者自己思绪的混乱，想头的奇巧，迂阔而又固执，遂将文白塑成了一尊乃文乃武，亦人、亦神、亦妖的怪物。文白胸罗星斗，吟遍江山；于圣经贤传、百家子史、天文地理、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不仅志存伊、周，贤追及门，智逮诸葛，忠高武

穆，侠赛朱家，勇超孟贲，才迈相如，文抗子建，历压一行，医比仲景，力胜乌获，貌如潘安，而且连生殖器也生得粗大，与众不同，一次排精足供一位饕餮吮吸一顿饭工夫。小说的结局，不用说是福祿寿考一应俱全。文白母水夫人寿至百岁，及见“六世同堂”。文白受天子崇礼，尊为“素父”。姬妾环列，生二十四男。男大又贵，且生百孙。孙又生孙，复有玄孙。百夷慑于神威，四灵集其家圃。凡人臣荣显之事并萃其一身。——其笔意荒唐如此。像这样的“典型”，相形之下，连“四人帮”提倡的“高大全”，也应为之逊色了。

这种现象该怎样解释呢？赵景深曾说：

作者一生坎坷，既是“家贫身老”，抑且“落第频年”（《哭妹》第六首），似不曾有甚欢快之事。而他在《野叟曝言》中偏把文素臣写的备极人间富贵，尽量的做他的“白日之梦”。这当是缺陷的填补和欲望的满足。其次，他写了许多著作，似都不曾在生前刻板，无非为贫所困。他就想把他的“文章经济”借小说以传。我们只须拿《野叟曝言》第七十八回与《读史余论》（此文及下《经学余论》皆载之《浣玉轩文集》——栾注）论三国事比较，再拿《野叟曝言》第八十七回与《经学余论》论《中庸》比较，便可看出二者几乎是相同的。作者是拿二《余论》的精采部分，尽量塞到《野叟曝言》这部小说里面去了。其他如论医论诗之处，更不胜数。（《夏二铭年谱》）

“白日梦”浑括的很好，与近代西方弗洛伊德心理学派的

潜意识及压抑说论旨契合。不知弗洛伊德心理学派中人曾寓目本书否？假若他们读一读这部小说并精研作者生平，会像哥伦布航抵美洲那样，发现一块可供驰骋的新天地。

不过这是就作者主体意识一面说的。另一面，作者毕竟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主体意识之形成，则又脱离不开时、地及家庭氛围，即历史的认同。还是鲁迅说的更好，二者兼得之：基于主体意识，他指出，作者借小说及文白来“炫学寄慨”，宣泄“抱负”；基于历史认同，他又认为，若文白者，“固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请看他的原话：

《野叟曝言》云是作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比之“野老无事，曝日清谈”（凡例云）。可知炫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雍正末江阴人杨名时为云南巡抚，其乡人拔贡生夏宗澜尝从之问《易》，以名时为李光地门人，故并宗光地而说益怪。乾隆初，名时入为礼部尚书，宗澜亦以经学荐授国子监助教，又历主他讲席，仍终身师名时（《四库书目》六及十、《江阴县志》十六及十七）。……盖江阴自有杨名时（卒赠太子太傅谥文定）而影响颇及于其乡之士风；自有夏宗澜师杨名时而影响又颇及于夏氏之家学，大率与

当时当道名公同意，崇程朱而斥陆王，以“打僧骂道”为唯一盛业。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际遇，固非独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中国小说史略》）

主体与客体，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是不宜偏废的。

杨名时为江阴闻人。夏宗澜为二铭诸父，著有《易学随记》。二铭把二人俱揽入小说中，称名时为时公，改宗澜姓文名雷字观水。观水与文白仍为叔侄。不过二铭把他所受理学薪传未写在文白身上，而是属之文白之母水夫人。二铭嫡母姓汤，水夫人系取汤字偏旁作之。

晚清以来曾广为流传二铭欲献本书的趣闻。说者谓：先是本书脱稿缮正，适值乾隆帝南巡，二铭以为此一生心力所萃，欲迎銮献之，以邀睿鉴。时朝廷文禁甚严，亲友及家人知其不可，玩个小手脚坏了他的兴头，未果献。徐再思《澄江旧话》卷二引何听松《野叟曝言补闻》述其原委如下：

相传是书成时，适值高宗南巡，乃装璜成册，欲呈御览。诸亲友恐触上怒，遭不测，力阻其献，不听；乃以危言动其妻，使阴阻之。其妻乃于每册毁四五纸。迨将献，故惊曰：“汝欲上呈御览耶？向为小儿女已毁去多纸矣！”夏怒甚，急为补缀齐全，而驾已沿江东下，不及献。

一说，夏女颇通文墨，且明慧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巨祸。又度其性褻执，不可劝止，乃与人谋，密用白纸装订一部，与原书等，即置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迨将迎驾，启袱出书，重加检

阅，则书犹是，而无一字矣。夏哭失声，以为是殆见忌于造物，故书遽羽化去也。女徐劝曰：“既为造物所忌，以不必进呈为佳。今天子性猜忌，父书又多失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网者，翁独不闻乎？”夏无如何，郁郁而罢。夏卒，女以此书为乃父一生心力所在，不忍湮没，将其润饰一过，即近日流传之本也。

这一传说，钱静方《小说丛考》、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花朝生笔记》，均有大体相同的记载。惟南巡事，一言圣祖，一言纯庙——乾隆帝高宗弘历。

不过，此皆为捕风捉影之谈，事出附会，不足信的。

其一、圣祖（名玄烨、谥仁）凡六次南巡。第五次在康熙四十四年，二月启銮，视河渡江至杭州，闰四月还京师。时二铭尚未出生。第六次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启銮，三月至江宁，四月驻杭州，五月还京师。时二铭尚为娃娃。钱静方的《小说丛考》写定于民国改元之初，时有关二铭及本书史料流布甚少，他自己又临事粗忽，致铸为此错。他不仅不知二铭生卒及主要活动年分，而且据西岷山樵原序仅知“是书为江阴夏君所作”，尚不知夏君即二铭。本书初出版时未署作者名子，人或以为夏宗澜所著，亦出于这一背景。

其二、据赵景深在所撰《夏二铭年谱》中考察，二铭献书的打算是有的，但他打算奏进的是他的《纲目举正》，而非本书。《纲目举正》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二铭在《自拟进〈纲目举正〉表》中说：

《纲目举正》，盖欲举《纲目》中不正之论而悉正之也。而家贫身老，不克匍匐入都，置篋有年，献芹无路。嗣于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十七日伏读军机处补交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七日上谕，以《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僻及肆行诋毁者，特命量为删润。臣窃谓《周礼》张时泰之说，流传日久，不若辞而辟之。臣所著《举正》一书，兼正诸说，不止专攻《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而于《发明》《广义》之偏僻而肆行诋毁者，皆已明著其谬妄而痛斥之，实足使读者共烛其狂肆之罪。

似此，可以不抱成见的说，这是有点希旨媚世的嫌疑的。然二铭两次拟献皆未果。他的族侄祖耀在为《浣玉轩著书目》中《纲目举正》一条所加的按语说：

祖耀按：是书既成，携入闽中，祈故友福建抚军富公纲奏呈，未果。归遇乾隆丙午(?)南巡，赴苏迎銮，拟躬进献，又有所阻。独惜以是古人今人未所及之论不昌于时，而尚沈尘篋为可叹也。

此可证二铭打算迎銮献书的事是确实有的，认为那就是《野叟曝言》则为不实之词。溯传误缘由，盖时光流失，真象已鲜为人知，至晚清本书忽出且畅行，道听途说者踵事增华，移花接木，遂把《纲目举正》掉包为本书了。

夏祖耀（或作耀，惟视二铭之子名祖焯，知此字亦应为火字旁）的按语无疑是勘定此案的重要书证，不过间有疏脱及误植亦须核实。第一，这里提到富纲，于此

我们得知二铭与富纲为故交。按《清史稿·疆臣年表六》，富纲巡抚福建为乾隆四十四年五月至四十六年五月间事。二铭当于此二年间携《纲目举正》入闽。显然二铭《自拟进〈纲目举正〉表》不是这时写的。此表之作，仍应与数年后他打算赴苏州迎銮献书为一回事。第二，按语“归遇乾隆丙午南巡”之“丙午”，可以肯定是误植。丙午为乾隆五十一年，二铭八十二岁。考乾隆帝循康熙帝旧例亦六次南巡，分别为乾隆十六、二十二、二十七、三十、四十五及四十九年。二铭进书表已提到乾隆四十八年八月恭读上谕一事，则其拟表及打算去苏州迎銮献书，必为四十九年春，即乾隆帝第六次南巡中。这次南巡系正月启銮，三月朔渡江，初六日驻蹕苏州，十六日抵杭。回銮复于三月二十九日驻蹕苏州，闰三月迂道江宁，四月还京师。南巡至是遂罢。乾隆四十九年为甲辰，二铭八十岁。赵景深失察，轻信按语之误植，径系此事于二铭年谱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之下，致以讹传讹。谨附笔为之订正。

其三，说部书素为士大夫所不齿，康乾间厉禁淫书、淫画、淫戏。这部小说为何等书，献之朝廷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二铭应比旁观者想得更多也更清楚的。二铭非坊肆才子而是正统读书人，除非他发了疯，是决不至于拿小说来干时要誉的。旧日许多白话小说作者隐去真实姓名，皆出于同样原因。《野叟曝言》脱稿未付梓，论者或以“家贫身老”缘饰之。其实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有所避忌宁愿缄之篋中。西岷山樵在光绪八年的印书序里，把二铭这一心情讲得相当清楚。山樵的五

世祖韬翁宦游江浙间，与二铭为知交。二铭尝以《野叟曝言》稿本就正于韬翁，韬翁亟请梓行，二铭未答应。他辞谢的原话是：“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二铭性情虽迂执，然就“言多不祥”及“非所以鸣盛”的自我评估来看，他还算有自知之明的。因而迎銮欲献本书云云，就二铭主观心态上也是讲不通的。西岷山樵印书序所提供的史料，除了说二铭为“康熙中”人不切合二铭的主要活动年代外，其余大体信而有征。遗憾的是，近今一些研究者把它忽略了。

由于二铭献书事至今尚困惑一些人，因不辞冗赘，条析如上，愿一廓清之。

二铭卒后约百年本书始掸尘而出。光绪七年辛巳仲冬，有毗陵汇珍楼活字本问世，版心上题“第一奇书”，首载知不足斋主人序。缮稿为江阴夏氏后人提供。此为初刊本。次年壬午季秋，又出现了申报馆排印本，首载西岷山樵序。缮稿为山樵五世祖旧藏。前者为残本，回目作百五十二回，其间多回复各有程度不同的残缺。后者增多二回，无脱简，谓为足本。论者或谓后者系据前者补足之。此说似无据。就通体上看，自以后者为佳，无明显罅漏。人民国，此书亦畅行，石印本及排印本迭出。世界书局出版有赵苕狂题序本，秽褻语删削略尽，是为洁本。赵苕狂谓，这个洁本的“娘家”——祖本，即二铭卒后其女儿的润饰本，并引《花朝生笔记》为证，此为故弄玄虚，以广招徕。它的祖本实亦为光绪壬午申

报馆排印本。惟其于正字与标点尚下过一番工夫，其功亦不可没。

这个新校本，乃取光绪壬午本为底本，校以世界书局赵苕狂题序本，斟酌去取，择善而从。凡碍目的性描写等，悉芟除之。惟于其夸大笔墨，怪诞本色，迂腐议论，以及妖僧左道行藏等，则悉仍原貌以存真。校勘人郑君言愚，三复白圭，多费经营，数易寒暑而藏事，用力亦可谓勤矣。原校勘者用心，在于存文献，观风俗，察世变，供一般读者披阅兼供研究者取资。我有幸阅读了缮正清稿，认为郑君是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目标的。今值新校本问世之际，谨就二铭及本书的若干轶事与掌故题此序，以质正于读者。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书。

序

且天下之所谓章回小说者，吾知之矣。曰《三国志演义》，世所称为第一奇书也。元本正史朽腐也而神奇之，宜若可以惬意而贵当矣，然而意征实而难巧，综其所纪，不过争地争城，杀人如草而已。而于朝庙之大经，圣贤之实学，茫乎其未窥涯涘也。曰《金瓶梅》，又世所称为第一奇书也。铸鼎象物，魑魅魍魉举莫能遁其形，然而猥褻之语，累牍连篇，诋为导淫，诚非臆说。况乎事不过日用起居之细，人不外卑鄙齷齪之流，展卷未终，辄复生厌。类乎《三国志》者，曰《水浒传》。长枪大戟，豪气逼人，而神奸巨蠹之心，使人于言外见得，亦古今来绝无仅有之书也。然而侈陈贼焰，藐视王章，命意既差，多文曷贵？脱胎于《金瓶梅》者，曰《红楼梦》。摹影事于帷灯匠剑，纪艳情于碗茗炉香，凡夫痴男怨女之心情，百世而下，犹跃然于纸上，洵言情之极，则赋恨之外篇也。然而才不胜意，学不副才，满纸铺张不过风云月露，十年梦幻绝无政事文章，虽曰小言，究伤大雅。外此者则有《品花宝鉴》，化《红楼梦》之局，而卒莫能出其范围，傍门倚户，卑无足道。至若《荡寇志》，则固矫《水浒》之失，而一以尊王为本者也。其人颇能究心于医算诸术，持论到极精微处，足以

启发胸次，涤荡襟怀，而一腔忠孝之心，复流露于行间字里。以视以上诸书，固已出一头地矣。惟酷好道家之说，牛鬼蛇神纷然纸上，取悦于俗目，不可谓非计之得也，其如长异端之气焰何哉。其余祸枣灾梨者，尚复汗牛充栋，纵使更仆难数，付诸自郅无讥间。尝上下古今，流览宇宙，欲于章回小说书中求一奄有众长，扫除众弊者，而卒不可得。

意者，章回小说固正人君子之所不屑为，多才多艺之所不欲为者乎？意者，章回小说之人，固皆坐井观天，一斑窥豹者乎？今乃于祸枣灾梨，汗牛充栋之外，竟得一书焉，曰《野叟曝言》。其书下蟠上际，旁烛无垠。其论性理之微，虽周、程、张、朱并世而生，亦当分一席以居之，以共捍陆氏明心之说。其论用兵之奥，虽孙吴复起，亦当卷旗解甲，肃立坛下，听其指挥。其论医学，虽与黄帝岐伯分庭抗礼，亦不为过，彼世之夸三折肱者，咸望尘而却步矣。其论算学，虽周髀、九章，亦或前席请益，彼僧一行辈，方兹褊矣。其论诗学，虽青莲、子美，咸愿把臂入林，至李杜以下余子，碌碌不足数也。然此特其显焉者也。其书更以崇正辟邪为己任，不特佛老之大悖乎圣人者，不惜大声疾呼，以冀挽狂瀾于既倒，即于儒术之中，有稍拂乎圣人者，亦必反复指陈，务使孔孟之道皎然与日月争光，不使纤尘得以蒙蔽。洵堪为圣学之功臣、尼山之肖子，又乌得以章回小说轻之哉！抑更有进者，每论一事，必先以低一层者作为陪笔，阅之已觉不可几反，然后追进一层以压之，令人有天际真人不可端倪之想。是固千古著述名家

所莫能望其项背者，而何论乎章回小说之流亚哉。

吾乃重有感焉。夫使若人得志，翼赞皇猷，坐而言者起而行其所设施，诎可限量？否则传道得徒，使天下有志于实学者，各得一艺以去，亦可慰半生扶翼名教之心，而乃终老牖下，仅托诸笔墨以传，且仅托诸章回小说之笔墨以传，夫亦大可悲矣。况乎恐遭世网，更以猥褻夸诞诸说错杂其间，以自污其书。呜呼，何所遭之不幸也！又况遭造物之忌，劳丁甲之收，无瑕之白璧，等于已破之金瓯，湮没者几百年，残缺者若干帙，苟不及今补葺传播人间，是使天地间绝无仅有之书，终汨没于兵燹风霜而外，奚其可者？爰于暇日，一一缮校完备，忝愚泰西字林主人，按日以活字板排印成册，以公诸世。夫而后向之所谓第一奇书者，皆将匿迹销声，不敢抗颜于章回小说中矣。

狂乎，奇乎，愛書
时光緒第一壬午芒种后三日，龙溪赏奇室主人撰。

野叟曝言序

(清) 西岷山樵

康熙中，先五世祖韬叟，宦游江浙间，获交江阴夏先生。先生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暇则登临山水，旷览中原之形势。继则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益有奇气，先生亦自负不凡，然首屈一指。先五世祖以官事过禾中，邂逅水次，一见倾倒。旋吴之后，文宴过从，殆无虚日。先生亦幸订交于先祖，屏绝进取，一意著书。阅数载，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识先生之底蕴，于学无所不精，亟请付梓。先生辞曰：“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经济显于时，犹将以经济家之言，上鸣国家之盛，以与得志行道诸公相印证。是书托于有明，穷极宦官、权相、妖僧道之祸，言多不祥，非所以鸣盛也。”先祖颔之，因请为之评注。先生许可，乃乘便缮副本，藏诸篋中，先生不知也。先生既没，先祖解组归蜀，风寸之夕，出卷展读，如对亡友。尝谓曾祖光禄公曰：“尔曹识之，承夏先生之志，慎勿刊也。”自是什袭者又百有余年矣。乃今夏六用，余友程子自海上购得此书，以予好读奇书，持以相赠，不觉不诧。余友为述刊